

城镇化 2.0 背景下乡村振兴价值重构与规划新策略 ——基于休闲产业的反思

于丰瑜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DOI:10.32629/ems.v8i6.20562

[摘要] 乡村休闲产业作为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近年来的实施中取得了重大的经济和环境成就，但是，在乡村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休闲产业也出现一系列问题。本文从价值取向角度，对休闲产业介入乡村农民劳动体系进行分析，发现资本逻辑以及休闲劳动对立两种观念，制约了休闲产业和乡村振兴长期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人本逻辑和休闲劳动融合为核心重构价值体系，并探索新的产业规划策略。

[关键词] 休闲产业；乡村振兴；人本逻辑；风景园林

自“十四五”以来，我国迈入城镇化 2.0 时代。在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大型城市和中心城市倾向吸纳高素质人才^[1]，改变了传统人口由乡村到城镇单向流动的城乡格局。乡村逐渐转型为资源源头，开始向城市“反向输出”。

近年来，以“三产融合”与“休闲旅游升级”为主导的乡村振兴虽显著提升了乡村经济与人居环境，但部分休闲产业在扩张中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本与消费主义陷阱。此趋势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核心，有损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亟需重新审视乡村振兴的价值取向与规划逻辑，更加科学合理的引导乡村产业发展。

1 乡村休闲产业

1.1 基本概念

在“三产融合”的政策导向下^[2]，乡村休闲产业蓬勃发展。其立足乡村特色资源禀赋与“乡愁”文化，借由“全域旅游”的概念，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核心，实现了“农-旅-生态”的深度交融。相较于城市日常休闲，其呈现显著的郊野旅游特征，旨在服务城市居民，成为乡村振兴成果向城市“反向输出”的核心媒介。除此之外，乡村产业振兴还包括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类型产业。

1.2 产业成效

研究表明，乡村休闲产业与乡村振兴水平呈高度耦合关系^[4]，有力推动了乡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丽乡村建设。

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上，引入体验农园、农村电商等新业态，促进产业结构多元化并巩固农业基础；同事引导城乡人口周期性流动，激发消费潜能，带动农民增收与经济提升。

在乡村环境与基础设施上，游憩需求倒逼乡村技术设施与环境的先期更新^[3]，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空间保障；产业的良性发展亦反向指引乡村物质空间向便捷、舒适与高效提档升级。

在乡村肌理与文化传承上，作为乡土文化的空间载体，其在尊重并保留原真性村落格局与风貌的基础上，使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完成乡村文化的活态传播、在地活化与创新发展的。

1.3 发展误区

尽管成效显著，但在资本过度介入与认知局限的驱使下，乡村休闲产业在长期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以下困境。

1.3.1 乡村休闲产业产品同质化

当前乡村旅游项目规划多停留在体验采摘、农田观光等初级形态，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相对滞后^[5]。项目建设往往忽视对乡土文化、地域民俗等地特征的深度挖掘，导致空间景观缺乏文化内核与独特吸引力。内生特质的缺失使产业陷入高度同质化陷阱，加之经营者缺乏对游憩体验的管理意识，导致产业效能大打折扣。

1.3.2 乡村休闲产业缺少人才技术支持

同质化困局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专业人才的缺失。盲目决策与规划设计的模式化操作直接削弱了景观产品的创新性。在运营端,服务主体多为未经培训的当地村民,专业素养与服务意识薄弱。这不仅推高了培训成本,更成为突破传统“农家乐”低端模式、实现品质升级的核心瓶颈。此外,乡村高素质劳动力向城市的持续流失,进一步制约了休闲产业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2 价值取向分析

乡村休闲产业的局部受挫,既暴露出实施策略脱离村情现实,更折射出底层价值观与城镇化2.0时代发展诉求的错位。

2.1 “乡愁”消费的单向性消解农民身份认同

乡村休闲产业本质上是为了满足城市居民游憩与消费需求而打造的“商业产品”^[6]。当前以经济效益和城市客群满意度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固化了单向消费模式,违背了乡村向城市“反向输出”的时代诉求。在此逻辑下,尽管农民受惠于物质空间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但游憩体系规划并未将原住民纳入核心受众。这种缺乏人文关怀的空间生产,剥夺了农民的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使其劳动脱离了内在的价值唤醒,从而难以从根本上遏制乡村人口持续流失的困局。

2.2 产业成果的局限性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

大部分农村进入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的目标不应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增长,而需覆盖社会治理、文化生态及农民全面发展的多维诉求^[7]。以休闲游憩驱动的“消费型”村庄虽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并兼顾部分综合价值^[8],却极易陷入深度“商品化”困境,沦为城市过剩资本构建新“消费性建成环境”的资本输出端^[9]。这种典型的增长主义逻辑,严重削弱了乡村经济长远发展的可持续性

2.3 休闲与劳动异化导致原住民休闲权被剥夺

产业发展带来的“休闲”红利多向城市居民倾斜,致使作为服务提供者的农民客观上丧失了自身的游憩权益。在此机制下,原住民的高阶精神需求被经济利益裹挟,劳动与休闲中蕴含的自我实现价值被让渡,反而易将农民推入消费主

义陷阱。当超额劳动成为换取利益的常态,农民在产业中付出越多,其自身的休闲空间越被挤压^[10]。这种异化加剧了劳动与休闲的二元对立,割裂了劳动实践与个体精神成长的内在联结,最终造成农民深层游憩权利的结构性剥夺。

3 价值体系重构

为规避新型乡村增长主义陷阱,深化乡村振兴内涵,亟需重塑乡村休闲产业的底层逻辑与价值取向,实现从资本主导向人本主义的范式转换。

3.1 回归人本主义,挖掘消遣经济

城市资本的逐利扩张与乡村资源错配,易导致产业陷入深度“商品化”,长期面临内生动力枯竭与人地关系割裂的崩盘风险。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必须摒弃单向度的资本逻辑,坚守人本主义的伦理视角。在城镇化2.0与后脱贫时代背景下,乡村发展诉求已由基础物质生产转向深层精神与文化价值建构。因此,应依托包容性的在地制度,挖掘并重塑基于原住民生活习性的“消遣经济”^[11]。该模式旨在通过拓展乡村公共交往空间与重构社会网络,使原住民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兼具生活质量、自由度与精神满足感的在地休闲体验,真正实现乡村精神财富的内生增长。

3.2 重塑价值认同,促进劳动与休闲融合

美丽乡村建设需在合理利用资本扩大生产优势的同时,践行以农民为中心的平衡发展观。当前,外部植入的休闲产业常使原住民陷入被动的“休闲劳动化”困境,导致劳动异化与主体性剥夺。为实现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必须重构原住民对劳动的价值认同,推动在地劳动的“体面化”。体面的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获取社会保障、职业尊严与实现个体全面发展的关键途径。鉴于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是劳动与休闲的共同底层逻辑,当原住民能够在体面的劳动空间中建立良好的社会交往并获得精神愉悦时,劳动过程便内化了游憩属性。这种机制上的重构,最终能促使原住民的“劳动”与“休闲”走向深度的融合统一。

4 乡村休闲产业规划新策略

4.1 外部策略:强化科技支撑,驱动产业链延展与效能跃升

互联网与科技的深度介入已实质性重塑了乡村休闲产业,催生出现光体验等新型业态,有效弥合了城乡信息差并大幅延展了产业链条^[12]。在城镇化2.0语境下,政府需强化技术下乡与政策扶持,引导乡村主体革新农业生产范式。此举不仅能提升农业效能、对冲劳动力流失困局,更能将原住民从繁重的传统农务中解放,为其参与社会交往、重构在地游憩生活并实现个体价值提供时间与物质保障。

4.2 内生驱动:确立主体地位,依托乡村自治与人才引领

为确保规划成果的长效管控,产业规划必须确立原住民的核心主体地位^[13]。一方面,需充分激活乡村自治的内生动能。原住民对在地风貌肌理、生活秩序及宗族治理网络具备深度认知,由其主导的聚落空间布局与资源配置更契合本真的乡土营建价值观,有利于游憩产业的在地化落实。另一方面,应建立弹性流动机制与创新孵化平台,通过政策倾斜吸引创客下乡与乡贤返乡扎根,发挥其在空间活化与产业提档中的引领作用,加速城乡要素的双向融合。

4.3 协同演进:统筹规划时序,促成产业迭代与素养提升

乡村振兴是一项受多维要素制约的系统工程^[14],亟需摒弃急于求成的资本扩张逻辑。鉴于当前产业诉求常与乡村综合承载力失配,必须强化全局与前瞻性统筹,合理控制空间开发步调,并为未来演进预留弹性余量。稳健的时序要求产业端保持持续内省:精准识别在地禀赋,筛选适配乡村肌理的游憩业态,谋求资金的内生性循环。同时在主体端,需在夯实物质基底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充实原住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深化其对城乡协同、劳动与休闲价值的认知,实现产业生态优化与居民综合素养的双轨同步提升。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5.
-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2-01-04.
- [3]金云峰,卢喆,吴钰宾.休闲游憩导向下社区公共开放空间营造策略研究[J].广东园林,2019,41(02):59-63.

[4]庞艳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11):315-320.

[5]王雨祥,张万荣.美丽乡村建设下乡村休闲旅游景观规划研究[J].山西建筑,2021,47(19):37-38. DOI:10.13719/j.cnki.1009-6825.2021.19.013.

[6]陈友华,庞飞.乡村振兴何以可能——后脱贫时代的“三农”之思[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3):124-132.

[7]金云峰,方凌波.基于景观原型的设计方法——探究上海松江方塔园地域原型与历史文化原型设计[J].广东园林,2015,37(05):29-31.

[8]胡书玲,余斌,王明杰.乡村重构与转型:西方经验及启示[J].地理研究,2019,38(12):2833-2845.

[9]杨伟荣.后脱贫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伦理审视与价值重构——基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问题分析与优化思考[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02):61-70. DOI:10.20089/j.cnki.issn.1009-105x.2023.02.005.

[10]张永红.异化劳动视阈下的休闲异化——兼与异化劳动“三规定说”商榷[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09):124-128.

[11]蒋阳飞,杨晓虎.体面劳动的伦理内涵和道德诉求[J].伦理学研究,2010,(06):114-116. DOI:10.15995/j.cnki.11xyj.2010.06.011.

[12]肖婧,刘化高,黄强,等.城镇化2.0背景下乡村振兴的规划逻辑思辨[J].规划师,2022,38(07):141-144.

[13]金云峰,俞为妍,汪翼飞.基于规划视角的城乡绿地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城市林业,2014,12(02):44-47.

[14]金云峰,杜伊,陈光.生态工程综述——基于“风景园林工程与技术”二级学科的视角[J].中国园林,2015,31(02):89-93.

作者简介:于丰瑜,1999年生,男,河南安阳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法与技术。